

学者书库

蔡建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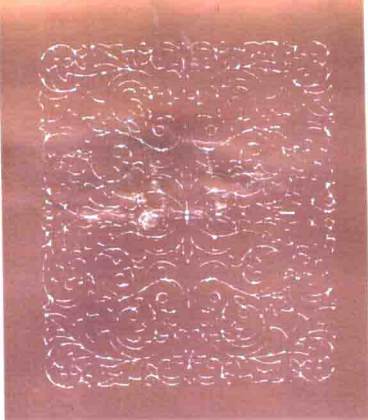
蔡元培
与近代中国

Caiyuanpei Yu Jindaizhongguo

史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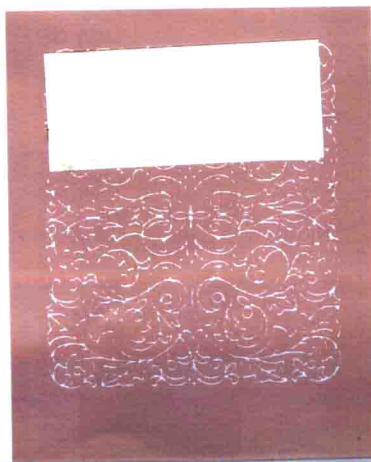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蔡建国 著

蔡元培与近代中国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54183 0

责任编辑 方小芬
装帧设计 范一辛 闵敏

学者书库·史丛
蔡元培与近代中国

蔡建国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插页 8 字数 241000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501—3000

ISBN 7—80618—263—2/k·226

定价:18 元

序 一

蔡元培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激烈动荡、变化多端的时代。他经历过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抗日战争等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战争的时代;经历过清王朝、袁世凯、北洋军阀以至国民党统治的时代;经历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急剧变革的时代,在思想领域里面面临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的冲突。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中,有的人落伍了,有的人后退甚至开了历史的倒车,蔡元培经受住了严酷历史的考验,他一生追随光明,追求进步,始终站在时代的潮流面前,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先驱,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以翰林参加革命,并一生坚持进步,在中国历史上仅他一人,这足见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蔡元培对中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是一位著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一位有胆识、多贡献的教育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一位掩护新思想势力、支持新政治运动的思想家;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他又是一位为自然科学奠定广大基础、规定发展方向的伟人。蔡元培在这些众多的重要作用中,当推他对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功绩为最高,因此说他是近代以来中国最有功的教育部长和最伟大的大学校长,这决不是太过。

对于蔡元培思想和生平事迹的研究,如从我完成于1941年、出版于1950年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算起,已有近半个世纪的

历史了,尤其近十多年来,出版了各种版本的蔡元培文集,有关的研究论著也不断面世,研究论文更是大量发表,蔡元培研究出现了很好的局面。研究蔡元培的思想,应当弘扬他的精神,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进步提供借鉴。

我认为,在“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问题上,应该以时势为主,以英雄为次,而不是二者同等,更不是只有英雄造时势,也不是只有时势造英雄。例如蔡元培亲自主持北京大学时期,是在北洋军阀时代而不是在清朝与国民党政府时代,这就是“时势造英雄”的明证。但在同一北洋军阀时代,严复、马相伯等人都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何以一直暮气沉沉,不能一新人们耳目?这又是英雄对时势也能起了作用的明证。对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与北京大学在近代史上、教育史上的地位,当作如是观。蔡元培之所以能跟随时代的潮流前进,成为进步人士和青年的卫士与保姆,在于他的思想的日新。

本书是作者蔡建国博士在长期研究蔡元培思想和生平事迹的基础上,在阅读了众多的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力作。迄今为止出版的蔡元培研究著作,几乎全是评传性质,专题研究著作很少见,尤其是以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为主题的研究著作仅此而已。

此书出版之前,我读了全稿,感到本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作者以历史发展有其连续性的规律出发,在研究蔡元培思想时,始终将他紧紧放在激荡的近代中国社会中去考察,抓住社会与蔡元培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在运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蔡元培思想形成的主、客观因素,并非就事论事。本书对蔡元培的传统与近代化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作者围绕着社会对人物思想产生影响的关连性、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和追求中国近代化道路时的艰难性以及近代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中,变革自身和不断进取精神的连续性等方面来揭示蔡元培思想的,因此可以说,对他思想的刻划有很充分的说服力。作者对蔡元培

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事情作了交代,例如,蔡元培对戊戌变法之看法和态度,蔡元培与日本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分析,形成了新的观点,对于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作了回答。

值得顺带一提的是,作者旅居日本十年,留学期间认真学习新的治学方法,不断注意世界研究中国史学的最新成果,开拓自己的视野,积累研究心得,治学和写作的方法是严谨的。

我之所以高兴地为本书作序,不仅是出于鼓励和支持青年学者的研究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对蔡元培文化和教育近代化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在当前注意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事业中有所启示,并期待着对蔡元培研究出现更新的成绩起到促进作用。

总之,此书真是原原本本,几乎应有尽有,而评价也很客观,不愧为自有关于研究蔡元培以来的一部佳作。

蔡尚思

1996年12月7日于复旦大学

序 二

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常常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年代,在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思潮冲突较量的复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蔡元培所经历的近代中国就是这样。那时候,古老的旧中国正在死亡,人民的新中国还处在诞生前,周围的一切变化得那么快,可供选择的方案似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要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对推动历史前进作出重大贡献,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对处在这种复杂环境中的优秀人物作出恰当而深刻的剖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蔡元培在他七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确实做出了许多令世人为之吃惊的大事来:他26岁中进士,两年后被授翰林院编修,这在常人看来正处在春风得意的时刻,但他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却视功名利禄如敝屣,投身反清革命,甚至准备从事暗杀活动,以后又远赴海外,像一个穷学生那样,从头攻读新的学问;他向来被人看成温和敦厚的长者,但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恶浊环境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却能以凌厉无前的姿态,大刀阔斧地推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教育改革,开创一代新风,使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摇篮;处在过渡时代,他一身而兼有东西方文化之长,在这两方面都有很深的根底,而又能把它们熔铸成自己的独有的思想体系;当他已成为众望所归的学界泰斗和政治元老、并且走过一段短暂的曲折路程后,又能义无反顾地和宋庆龄、鲁迅等一起,创立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猛烈抨击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受到全国人民的景仰。这一切看起来带有戏剧性

的变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自然会有力地吸引后人的关注。

蔡建国教授的近著《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后人期待对这些问题得到解答的愿望。全书的论述,始终坚持把蔡元培的言行放在当时剧烈变动着的时代大背景中来考察,细心剖析他的思想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变化的,并且把它作为一个合乎逻辑的完整发展过程来加以说明。蔡元培前后的思想变化中,有没有什么内在的、具有一贯性的主导因素?作者对这个问题也努力作了挖掘。他写出了蔡元培的爱国民主思想和外柔内刚的性格。蔡元培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一直怀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强烈责任感,驱使他从不停步地为寻求中国的出路而进行着艰难的探索。蔡元培素来淡泊名利,待人宽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原则问题上却决不苟且,表现出刚正不阿的凛然正气。作者在这些方面的许多刻划是成功的。

“兼容并包”,是蔡元培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色,也容易遭到某些误解。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的探讨。书中写道:“蔡元培在提出和实践他的‘兼容并包’思想时,是有所选择的,决非对新旧文化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在旧文化占据社会各个领域的时候”,“他要兼容的是新思想,保护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播。他是以繁荣学术为前提的。”这些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再看蔡元培容纳一些政治或文化上持保守态度的人(如辜鸿铭、刘师培等)在北大教书,也是着眼于他们确有学问,学生可以从他们这里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那些并无学问的官僚政客,就不在他容纳的范围之内。这种“兼容并包”也不是没有原则的。

书中除了对蔡元培的一生经历作了纵向的考察外,对一些重要问题还作了横向的剖析,如蔡元培所受日本文化、德国文化、法国文化的影响,他为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作出的贡献等章节,都是很值得一读的。

所有这些论述,作者不是像时下有些著作那样,把某种现成理

论框架作为出发点,而是以翔实可靠的事实材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书中除依据《蔡元培全集》所收文章、著作外,大量引用蔡元培从光绪二十年到他去世前的日记手稿,还访问过不少同蔡元培曾有直接接触的人,从而使读者对书中的论述觉得真实可信。这种学风也很值得提倡。

金冲及

1996年11月26日

序 三

我现在正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这篇序言就是在该研究所的研究室里写成的。蔡元培是1928年设立的中央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曾邀请了大量进步学者前往任教,他对于有学问但思想保守的学者也没有从大学中排除出去。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不仅在近代中国为实现学问独立作出了贡献,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也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如果我们追溯到过去,留学德国和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等都给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蔡元培的思想的形成以深刻影响。

蔡元培也是一位政治家。他在辛亥革命以前是光复会的指导者,革命成功以后作为教育总长从事教育行政的领导工作。

蔡元培的这些多面性,从一个整体来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通过蔡元培来理解近代中国。蔡建国氏长期以来一贯坚持对这一难题进行研究。

1985年9月16日我访问上海时,得到了当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的蔡建国氏在上海火车站的迎接,这是我与蔡氏的最初相识。那时他已经有《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问世。此后,他有赴日留学的机会,于1988~1990年作为庆应义塾大学地域研究中心的访问研究员,在本校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期间,蔡氏完成了本著的基础——关于蔡元培的研究论文,这是包括他亲赴蔡元培曾经留学过的莱比锡大学进行史料调查在内的努力后的结果。不久,于1990年他在柏林洪

堡大学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审查和答辩,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我作为审查委员之一当时也去柏林进行了有关审查和答辩等工作,对于那时的成果以这种形式予以出版,我从内心感到高兴。

山田辰雄

1997年1月

(本序言作者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博士、教授、法学系主任)

目 录

序一.....	蔡尚思(1)
序二.....	金冲及(5)
序三.....	山田辰雄(9)

绪 论.....	(1)
----------	-----

上 篇

第一章	迈向士大夫的道路	(15)
第二章	成为新型知识分子的过渡	(27)
第三章	走上新路	(35)
第四章	在反清革命中	(54)
第五章	日本文化的影响	(69)
第六章	留学德国、学习西方文化.....	(93)
第七章	考察法国文化和开创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20)

下 篇

第八章	蔡元培文化思想及其意义.....	(131)
第九章	蔡元培与近代中国教育.....	(148)
第十章	蔡元培与近代中国科学事业.....	(200)
第十一章	蔡元培与孙中山.....	(213)
第十二章	《新年梦》与社会主义理想.....	(230)

第十三章	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	
		(248)
第十四章	蔡元培晚年的政治活动及其意义	(273)
结 语		(294)
后 记		(297)

绪 论

近代中国的先驱思想家们为振兴中华作出了不屈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根据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规律,不断总结先哲们为后人留下的思想遗产,研究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轨迹,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一

19世纪中叶,落后的东方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威胁,有着几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被英国殖民主义者用大炮轰开了长期闭关自守的“天朝”大门以后,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封建大国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政治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和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在经济上,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列强的侵略、剥削和掠夺,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危机,而民族矛盾的上升又促使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西方列强通过“通商口岸”向中国内地冲击,严重地危害着中国的主权,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在这“强敌”的进攻之下,传统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严厉挑战。中西文化的激烈摩擦和冲突,使中国人被迫开始与高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台湾文献丛刊》第131种第24卷,第24页。

度发达的西方文化接触,其后果是使一部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对传统文化有无存在的必要失去信心,因而导致思想界出现了全盘欧化或全盘国粹的激烈论争。西方列强的入侵,也给中国带来了尖锐而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由于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使这个古老的封建大国,处在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阶级斗争风暴异常激烈,政治变革日趋急剧的时代。这一形势,康有为称之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在如此深重的危机面前,一些有识志士看到了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与迅速崛起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开始艰难地探索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近百年来,他们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了建立符合近代潮流的新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尽心竭力,锐意改革。

鸦片战争前后,在一些比较开明的汉族地主阶级中间产生了抵抗外来侵略和要求社会改革的思想。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就是代表人物。他们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重大课题,以期对社会进行改革。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就明确地反映了这一愿望。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论”和洋务思潮的出现,则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在坚守传统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的同时,采用西方科学技术以“致用”的观点的理论化与具体实践。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和付之实践的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宣传西方文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对中国的科技进步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它不能阻止列强和封建专制主义接连不断地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耻辱和灾难,更无法彻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但是它毕竟孕育和促使了中国近代化思想的产生。

中法战争以后,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由经济改革发展到政治改革,而比较全面地提出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使中国近代化的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4页。

则在甲午战争以后。

甲午战争的惨败是“中国睡而将醒”^①的重大关键,它引发了思想界的变革骚动。“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②，“中国维新之萌芽,自中日之战生”^③。坚持“变法论”的代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已名存实亡,只有立即变法,才能救亡立国,“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④。他认为,日本战败清国的原因是因明治维新推行了近代化。然而,变法维新的结局揭示了“变法论”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它引起了有识之士对救亡图存道路和方法的重新思考。如果将视角从“变法论”转到“革命论”上,就不难发现,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反清民主主义革命派以暴力革命为手段,以法国大革命时期所揭示的“自由、平等、博爱”为目标的革命方式,已是拯救中国前途的唯一方策了。“革命论”一方面是面对“西方冲击”的对应理论——恢复中华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是学习西方的结果。恢复和振兴中华,是孙中山革命理论的核心,因而它以对内消灭清王朝,对外取消列强的“压境”为前提,也是他完整的革命目标的关键。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理论,以及他所领导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运动,是在把握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展开的,由对“器物的觉悟”升华到了“制度的觉悟”的程度,表明了先驱思想家在探索拯救祖国命运这一时代命题上的思想的日趋成熟。思想界从“洋务论”、“进化论”、“变法论”、“国家观”、“民权观”等到“革命论”的鼓吹,到“君主立宪”和“民主

① 蔡元培:《绍兴推广学堂议》,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0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第1卷,上海·中华书局第113页。

③ 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第3卷,第43页。

④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见《康有为政论集》第211页。

共和”的论战,导致了封建专制政权被民主共和政体取代的政治行动,这又反映了思想家们从西方的思想体系中找寻救国的理论和方法,它说明西方的思想从被迫打开的中国国门中奔涌而进,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变化的契机。“借助于西方的思想体系为中国革命的目的服务,它反映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帝国主义所起的作用之一是深刻的革命作用,尽管这完全是出自无意。这种革命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文化方面和知识方面。帝国主义不仅破坏了旧的儒家秩序,从而使得革命成为可能并在实际上成为必然,而且,作为一种副产品,它还反对中国的旧传统与旧制度的近代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观念和思想体系。中国革命者运用西方的工具和观念不仅砸碎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而且也摆脱了中国传统的束缚。”^①

因此,如果从纵横两方面来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话,冲击——探索——革命——发展,构成了晚清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救亡图存——民族独立——繁荣昌盛,则是近代中国人的历史追求。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理想,是对近代中国革命的目标和近代中国人所担负之历史重任的高度概括。围绕着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孙中山和他的同事们所作的努力,为后人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思维方法。

在振兴中国的潮流中,身为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也随着时代的步伐,思考着中国的改革和近代化问题。

^①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李玉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